

# 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发生路径、内在逻辑及意义评析

马雪松, 周云逸

**摘 要:** 在政治科学的新制度主义之中, 社会学制度主义作为重要的理论流派与分析路径, 受到政治学者的高度重视。社会学制度主义不仅对政治科学及制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为制度理论的建构做出了积极贡献。考察社会学制度主义路径的确立, 分析这一流派的内在逻辑, 并对其理论意义及不足进行评述, 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社会学制度主义; 新制度主义; 政治科学; 制度理论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608(2011)03-0061-05 **收稿日期:** 2010-07-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10ZD040)

**作者简介:** 马雪松, 博士,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博士后 130012 周云逸, 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 讲师 524088

长期以来, 政治制度是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制度研究也是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 当行为主义成为政治科学的主导研究范式, 在科学主义旨趣高度勃兴的形势下, 传统制度研究路径的缺陷逐渐显现, 其重要性也受到行为主义的挑战。到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 在政治科学内部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系列理论发展, 构成了制度研究得以回归并最终实现复兴的基础。制度概念和制度分析在经历一段时期的消隐之后, 不仅获得了新的理论生命力, 而且以不同的研究路径作为理论支撑, 从而具有了不同于传统制度研究的内涵。针对制度研究蓬勃发展的形势, 政治学者马奇和奥森于 1984 年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论文“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的组织因素”。这不仅标志着新制度主义在政治科学中的兴起, 并为制度研究空间的进一步扩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石。

对于来源多样、构成复杂、内容丰富的新制度主义, 政治科学研究者如何在如何划分这一理论路径的问题上往往难以达成一致。在各种划分方式中, 以霍尔与泰勒提出的“三分法”最为著名, 即把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划分为历史制度主

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流派。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相比, 社会学制度主义有着明显的不同。一方面,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尽管受到经济学尤其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影响, 但它和历史制度主义都位于政治科学研究领域之内, 而社会学制度主义则主要产生于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之中, 在研究路径、分析角度和关注对象上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存在显著的差异。另一方面, 在社会学制度主义内部, 存在着不同的变体, 尽管这些变体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某种相似性, 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却远远大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及历史制度主义两个流派内不同变体之间的差异。

社会学制度主义虽然产生于社会学内部, 但政治学者对其研究路径和理论观点十分重视。正如霍尔和泰勒指出的, “伴随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在政治科学中的发展, 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流派也独立发展出来”<sup>①</sup>。政治学者彼得斯出于类似的考虑, 在《政治科学的制度理论》中指出, “如果不对社会学中的制度主义文献的重要性加以审视, 那么就会潜在地失去一

① Peter A. Hall and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1996, Vol. XLIV, p. 946

个理解政治制度的重要手段”<sup>①</sup>。因此,考察社会学制度主义研究路径的确立,分析这一流派的内在逻辑,并对其理论意义及不足进行评述,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 一、社会学制度主义研究路径的确立

社会制度及其他制度性结构奠定了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吉登斯曾概括性地指出,社会学“涉及社会制度的比较研究”<sup>②</sup>。社会学者布鲁斯也认为,社会学是有关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和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的研究。<sup>③</sup>从一般意义上讲,社会学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是政治学者尤其是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者对社会学制度研究新进展的概称。与此不同的是,在社会学者那里,为了区分新制度主义同旧有制度研究模式的差别,往往不使用“社会学制度主义”这一名称,而是自称为“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社会学新制度分析”或“社会学新制度主义”。

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往往对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来源和组成莫衷一是。综合研究者的观点,政治科学的制度研究者所理解的社会学制度主义,主要可分为马奇和奥森确立的规范制度主义(normative institutionalism)、迪马吉奥和鲍威尔提出的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以及倪志伟等研究者提出的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这三个变体。具体观点如下:

1. 规范制度主义。马奇和奥森引发了新制度主义研究在政治科学中不断升温,而他们的理论观点明显地受到社会学制度理论的深刻影响。<sup>④</sup>马奇和奥森不仅强调组织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还主张规范秩序和符号秩序的重要地位。他们认为政治行动者具有灵活性,易受影响且富于变化,而且依赖于文化并受到社会的

构造,因此“适宜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对于考察人类行为同制度背景之间的关系极为重要。另外,马奇和奥森还强调人类行动总是试图满足或实现其预期,而这样的行动总是处于具体背景之下,并深深根植于文化性、社会性、经济性和政治性结构之中。个体往往根据一系列规范和程序采取行动,规范和程序为那些依赖于文化的个体提供了适宜逻辑。<sup>⑤</sup>

2 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理论者迪马吉奥和鲍威尔在1983年发表的论文“组织场域中的制度性同形与集体理性”中,阐述了塑造现代组织同形(isomorphism)特征的关键因素在于组织场域中的文化要素与规范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强调合理性和效率的组织理论在解释能力上的不足。<sup>⑥</sup>到了1991年,鲍威尔和迪马吉奥正式提出了“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这一制度研究路径,进一步系统地分析组织、仪式、神话、文化和认知等因素对组织与个体的深刻影响。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体现了三个重要的理论转变,即远离了理性行动理论和功利主义观点,更多地转向社会生成论(social emergentism),并采用认知的和文化的解释方法(cognitive and cultural explanation)。<sup>⑦</sup>

3 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由倪志伟和布林顿共同编著的《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一书,延续了社会学关注制度现象及制度理论的传统,使制度研究在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得到了深化。从整体上看,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者主张他们的制度研究路径,不同于“先前已经充分确立的组织分析中的制度理论”,而是更加有意识地深入挖掘、梳理了社会学从学科确立以来的制度范畴和制度理论,并对它们进行了重新建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遵循着古典时期社会学的研究路径,不仅代表了社会学的新古典转向,还继承并发扬了古典社会学家及早

① B. G.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1999, p. 97.

②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页。

③ Steve Bruce, *Sociolog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8.

④ B. G.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1999, p. 98.

⑤ 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4, Vol. 78 (3), pp. 744-7.

⑥ 沃尔特·W. 鲍威尔、保罗·J. 迪马吉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

⑦ Andrew Abbott, “An Old Institutionalism Rea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992, Vol. 21, p. 754.

期制度主义者的学术遗产。另外,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认为自己同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相比,更注重制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希望克服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不足。<sup>①</sup>

总体而言,社会学制度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新制度主义流派,不仅表现出其内部不同路径之间的密切联系,还反映了它同政治科学中其他新制度主义流派之间的明显差异。一方面,尽管社会学制度主义的三种变体或路径有着不同的侧重,但仍然分享共同的特征和主张。有研究者曾对此恰当地指出,“规范制度主义和狭义的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都认定行动者的行为受到制度化规范和文化习俗的驱动”<sup>②</sup>。另一方面,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突出特征,使其区别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制度界定为规则或程序,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范畴则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惯例、规范及习俗。与这两个流派相比,社会学制度主义倾向于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主张同人类行动者的意义框架有关的符号、认知、道德模式等因素,都可以理解为制度,甚至认为文化本身也是制度。<sup>③</sup>

##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内在逻辑

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内在逻辑既体现在它对制度的理解上,还表现为它对制度的生成、维系、变迁这一制度演化过程的认识。社会学制度主义对于制度的一般性理解,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学制度主义往往不对制度和组织进行明确区分。“社会学关于组织及组织理论有着非常丰富的文献”,“然而社会学研究基本上没有对制度和组织进行成功的区分”。<sup>④</sup>一些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认为,组织是构成制度框架的重要

部分,而在其他社会学制度主义者那里,制度和组织是具有相等内涵的范畴。对于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来说,位于组织社会学内部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尽管包括多样化的研究取向,但是从制度的视角来理解组织无疑是这一流派所共有的研究旨趣和学术特征。<sup>⑤</sup>具体来看,迪马吉奥和鲍威尔认为,“组织场域(organizational field)就是由各个组织集聚起来的制度生活的认知区域”<sup>⑥</sup>。

第二,社会学制度主义倾向于将文化界定为制度。不同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所坚持的“算计途径”(calculus approach),社会学制度主义在回答“行动者如何行动,制度具有怎样的作用,以及制度如何随着时间的变更而维持”这样的问题时,更多地采取“文化途径”(cultural approach)。文化途径认为制度为人们的阐释(interpretation)和行动(action)提供了道德性或认知性模板,个体因而被视为一种深深嵌入制度中的实体。这个由符号、脚本(scripts)和惯例构成的制度世界为人们的阐释行为提供了过滤机制,它们不仅阐释外在的场景,同时也阐释行动者的自我认识,从而建构或约束人们的行动。对于这个由文化要素所构成的制度世界而言,其功能并非只是向策略行动提供有用的信息,而是影响行动者的身份认同、自我想象和具体偏好。因此,“社会学制度主义倾向于把文化本身界定为制度”<sup>⑦</sup>。“文化和制度在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标题下成了同义词”<sup>⑧</sup>。

第三,社会学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对个体产生强烈的影响。社会学制度主义保留了不同程度的方法论整体主义色彩,突出行动者的身份角色对个体的塑造作用。这一流派尽管对传统的方法论整体主义进行了部分修订,但还是主张个体行动者或个体组织的选择行为,均受到其他行动者及组织的深刻影响。<sup>⑨</sup>具体而言,社会学制度主义

① Mary C. Branton and Victor Nee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8, pp. 10—12.

② R. A. W. Rhodes, Sarah A. Binder and Bert A. Rockm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61.

③ Peter A. Hall and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1996, Vol. XLIV, p. 947.

④ B. G.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1999, p. 97.

⑤ W. 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3页。

⑥ 沃尔特·W·鲍威尔、保罗·J·迪马吉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第69页。

⑦ Peter A. Hall and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1996, Vol. XLIV, pp. 939—948.

⑧ Mark D. Aspinwall and Gerald Schneider, “Same Menu, Separate Tables: The Institutional Turn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00, Vol. 38, p. 11.

⑨ Mary C. Branton and Victor Nee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8, p. 10.

所强调的“社会之中的角色”观念,使它在解释制度对个体的影响方面,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相比具有严重的分歧。“社会生活存在于人们各自所扮演的角色中,而这些角色只有置于全部剧作之中时,才具有人们所能理解的意义”<sup>①</sup>。另一方面,社会学制度主义还倾向于将偏好的形成理解为内生性过程,认为制度性要素为偏好的选择设定了标准。社会学制度主义从“规范维度”或“认知维度”出发,认为个体偏好的形成并不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所假定的外生性过程,而是受到文化、规范、认知、符号等因素影响的内生性过程。马奇和奥森在这个意义上指出,“利益和偏好产生于制度性行动的背景之下”<sup>②</sup>。

第四,社会学制度主义突出制度化过程的影响与作用。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中,制度作为规则性和组织性的结构模式,从动态分析的角度来看,可以引申出“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概念。制度化的过程既包括人们根据规则行事,也包括共同体(communities)对不遵循规则的成员实施某种惩罚。<sup>③</sup>对于社会学制度主义来说,由于这一流派强调文化、规范、认知、观念等因素的重要作用,因此在行动者同制度要素的互动关联之中,制度发生作用的方式往往表现为制度化的连续且复杂的过程。彼得斯因此指出,“社会学制度主义往往不对作为实体的制度(institutions as entities)和产生制度的制度化过程作出区分”。这也使社会学制度主义在解释制度创设及制度演进方面,比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具有更大的优势。<sup>④</sup>

针对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社会学制度主义从其理论基础和具体主张出发,提出了不同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的解释方式。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对于制度的生成问题,社会学制度主义并不认为制度是从真空中产生的。由于这一流派对制度的理解极为宽泛,无论规则、惯例,还是各

种组织,甚至更为广泛的文化因素都可以界定为制度,因此如果形成了新的制度,那么它一定是在充满各种制度的环境里面出现的。一方面,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嵌入”文化背景或制度环境之中的人们不仅在选择上受到限制,而且文化因素也会通过规范或认知这两个维度发挥影响。<sup>⑤</sup>因此,新制度的产生(包括组织获得某种制度性形式)必然受到其他制度的影响,而这主要是通过制度环境或文化背景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学制度主义不同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并不认为制度是容易创设的。霍尔和泰勒指出,“个体与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某种‘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ing)的基础上,个体以这种实践理性作为展开行动的基础,并在一定情况下对可能的制度模版进行修订以设计出某种行动过程”<sup>⑥</sup>。然而,社会学制度主义由于强调这种实践理性机制的复杂性,认为制度的生成很难被有意设计出来。此外,由于社会学制度主义倾向于将文化理解为制度,对于行动者来说实际上“已经没有制度选择的概念”<sup>⑦</sup>。这主要体现在,被社会学制度主义看作制度的一些文化范畴,例如符号和信念等,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对其起源进行解释,从理论上讲都是非常困难且充满争议的。

其次,在制度维系方面,社会学制度主义提供了有意义的理论阐释。制度的维系主要涉及这样的问题,即制度在生成之后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和制度背景的影响,得以保持存在并发挥功能。一方面,社会学制度主义主张适宜逻辑及文化对个体行动施加重要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制度或组织是倾向于保持稳定的。这是由于个体偏好在更宏大的制度背景之中,或在文化环境保持稳定的条件下,往往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另一方面,社会学制度主义根据其组织理论,指出组织中的领导者能够在制度之内创造某种价值体系(value system),即便制度面临某些可能削弱其效用的客

① Steve Bruce: *Sociolog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3.

② 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4, Vol. 78 (3), p. 744.

③ Jan Erik Lane: *Co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Theory*,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66.

④ B. G.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1999, pp. 96-97.

⑤ Mary C. Brannon and Victor Nee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8, pp. 10-11.

⑥ Peter A. Hall and Rosamund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1996, Vol. XLIV, pp. 948-949.

⑦ Mark D. Aspinwall and Gerald Schneider: "Same Menu, Separate Tables: The Institutional Turn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00, Vol. 38, p. 9.

观状况,这样的价值体系仍然可以维系下去。<sup>①</sup>

最后,社会学制度主义为政治制度变迁的理论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框架。制度变迁可以看作制度安排在一定条件下由于受到某种因素的影响,而随着时间的发展脱离既有轨迹的过程。尽管有很多研究者关注制度变迁问题,但制度变迁仍是“政治制度分析中最弱、也是最难的一点”<sup>②</sup>。社会学制度主义不仅从多个角度丰富了制度变迁理论的内容,而且在多个方面深化了对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认识。一方面,从功能主义的观点出发,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能够寻找到必要的变迁途径以适应环境变化的压力。具体而言,这样的变迁途径可以是消极承受或遵循外部力量的作用,还可以是积极改变或塑造制度环境的形态。另一方面,从种群生态模式 (population ecology modes) 的观点出发,制度性组织同生物机体的种群形态 (population of biological organism) 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组织之所以能够存在,正是由于组织位于结构性的“生态环境”之中,而后者有能力承载前者并提供各种机会来支持组织的存续。<sup>③</sup>

###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意义评析

社会学制度主义产生于社会学的制度研究传统之中,但它受到政治学者的重视并被认为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流派,这一点本身便说明了它对政治科学以及制度研究的重要意义。概括而言,社会学制度主义对制度理论建构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和研究途径,对于政治科学中的其他两个新制度主义流派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主张修订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整体主义,不仅突出个体行动者的能动性,还强调这种能动性实际上是受到背景限制的理性 (context bound rationality),从而促进社会学研究同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研究相互借鉴。然而,同政治科学中的理性选择制

度主义相比,社会学制度主义无疑更注重社会整体的重要性,而不是以个体作为出发点。

其次,社会学制度主义对文化分析与组织分析的重视,丰富了政治科学制度理论研究的内涵。从政治科学的立场看,社会学制度主义为新制度主义研究增添了文化性或观念性维度,从而在规范和认知的角度更好地理解制度。同样,无论是商业组织还是政治组织都是政治科学中的其他新制度主义流派所关注的重要对象,而社会学制度主义致力于深入考察组织理论与组织运作,这无疑为前者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助益。

最后,社会学制度主义在制度理论的规范研究上具有某种比较优势。就新制度主义整体研究而言,三个流派都和经验研究有着密切关联,其中社会学制度主义尤其在实证研究中发挥了重要贡献。由于社会学制度主义较另两个流派更为注重规范性要素与认知性要素,加之当代社会学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学术资源,这些都有助于研究者从观念角度探究个体与制度的关联与互动,从而在规范意义上更好地搭建有关制度的合法性及正当性的理论架构。这也意味着,社会学制度主义在规范层面上构建或回答“什么是好的制度”的问题上,比另两个流派具有更多比较优势。

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理论意义尽管受到广泛肯定,但是一些研究者也指出它所具有的缺陷与不足。其一,社会学制度主义所界定的制度包含认知、规范和结构等要素,这不仅“过于宽泛并模棱两可”,而且往往缺乏对制度与组织进行明确区分,这实际上存在严重的问题。<sup>④</sup>其二,有政治学者指出,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理论主张在很多时候苍白无力,“它们在制度创设或改革的过程中,忽略了承载着不同利益的行动者之间权力冲突的重要性”<sup>⑤</sup>。其三,正如一些社会学者指出的,社会学制度主义对文化和认知的强调虽然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社会生活,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社会学长期以来重视社会结构的研究传统。<sup>⑥</sup>

(责任编辑:杨嵘均)

① B. G.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1999, p. 104.

② 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政治科学新手册》,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223页。

③ B. G.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1999, p. 108.

④ B. G.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1999, pp. 105-106.

⑤ Peter A. Hall and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1996, Vol. XLIV, p. 952.

⑥ Andrew Abbott, "An Old Institutionalism Rea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992, Vol. 21, p. 754.